

# 翻译符号学的概念

贾洪伟

(首都师范大学 大学英语部 北京 100048; 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天津 300204)

**摘要:** 本文以翻译概念的衍化为切入点,总结学科发展观的演变,以翻译与符号学联姻之不足为焦点,探讨符号转换概念——翻译符号学,区分翻译符号学与符号翻译学和符号学翻译研究的同异,确定翻译符号学作为新兴学科的属性问题。

**关键词:** 翻译; 符号翻译学; 符号学翻译; 翻译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16)01-0094-04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and its diachronic features of the definitions of *Translation* since 1957, especially its inadequacies of the marriage between semio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with the reference to Górlée and Torop's relevant works, redefines translation semiotics in terms of macroscopic views of translation, distinguishes translation semiotics from semio-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semiotics, and clarifies the issues related to translation semiotics as an emerging new discipline.

**Key words:** translation; semio-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studies in semiotics; translation semiotics

## 1. 引言

索绪尔被认为是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创始人。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以其能指和所指的结构系统来建构世界(董敏 2005: 5)。就缘起讲,自人类降生地球之日,符号就随之诞生。彼时,个人与个人、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业已出现符号的阐释与转换。从“理解即翻译”(Steiner 1975)、“对话即翻译”(Landa 1995)、“原文本重写即翻译”(Lefever 2005)等广义角度看,符号的交互使用已经构成翻译行为。待到书面文献出现,因信息交流和政府传通之需,公元前的人类世界就出现狭义的翻译行为。

早在公元前二三百年,人类就已经零散地归纳过翻译实践的经验,只是不具备今日的理性化、系统化的学科化特征。针对翻译行为与相关现象的理性探索直到近代才出现,学科化的理性探讨更是20世纪的学术事件,直至20世纪70、80年代学界才思考学科化的构建工作。随之出现众多的流派,如语文学派、结构语言学、文艺、比较文学、美学、伦理、哲学、后殖民、女性主义、食人主义等。因各派学者不是相互批判以求推进,就是各自为营,专门构建自身的理论系统,可大多仍着重言语符号层面,特别是文学领域的文字文本,遗留众多广义翻译范畴内的空白点,如思维与言语符号的双向转换、实体与符号转换等,不但影响翻译概念界定的统一性、翻译理论的构建,更影响区域、民族、世界翻译史的书写和构建。

因而,在翻译研究发展为独立的系统化学科的今天,有必要梳理翻译概念的演化历程,总结学科发展观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以翻译与符号学联姻之不足为切入点,探讨以

广义翻译为对象的符号转换概念——翻译符号学,区分翻译符号学与符号翻译学和符号学翻译研究的同异,确定翻译符号学作为新兴学科的属性问题。

## 2. 翻译概念衍化与学科发展观

在古代,翻与译所指略似,但非今日所指。据史料记载,宋代法云(1088—1158)之《翻译名义集》已出现翻与译结合的术语“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虽系梵汉对译,但明确了这一术语的狭义指称。作为符号转换的专门术语,翻译历经千年演变,所指发生很大变化,因而在当代探讨与翻译有关问题时,有必要回顾翻译所指的演变及其发展观的更易。

以收集的43条翻译定义<sup>①</sup>为据,笔者分析1957年以来的翻译定义,探讨与之相随的学科发展观。纵观国内学者的定义,我们发现三点特征:1)翻译系两门语言符号之间的内容转换与思维活动,大多强调等值,或强调文学的创造性等值,或强调原译文本的相似度,关于符号转换过程少有涉及;2)翻译系表达同一客体语符的辨识、阐释、明示—推理与再创作过程,但对过程加以确切阐述者少;3)受国外译论影响,出现交际学与信息学视角的定义,但专业化、系统化、科学化均不充分。从翻译符号学视角看,绝大多数国内学者的定义囿于原语与译语、原本与译本、作者与译者、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忠实与背叛、等值与相似等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范畴,寻求结构与表达、风格与文化等层面的绝对忠实,不免陷入皮尔士符号三元观范畴内的一级、二级和二级退化符号的伪指号译论。此外,尚未从符号学角度定义符号转换活动与过程,也很少涉及符号学视角下的翻译三元

观。

单纯语言符号内部有音、形、义三个构件,形成两对形式—意义关系、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赵宏 2011: 13)。外国学者的定义涉及的理论范畴广,内容丰富,逻辑界定系统,大体可归为六类: 1) 具有结构主义特征,如原作与译作、口语与书面语、原本与译本、忠实与等值、功能与内容等,特别是形式主义之表层与深层、形式与意义等,旨在跨越符号障碍求等值,不似国内学者那般以等值翻译观一统天下; 2) 仍以原语与译语符号之间的意义转换为终极目标,不似国内学者那般纯粹,而是融入很多哲学思想,如意义阐释因素、维特根斯坦之语言游戏观; 3) 侧重从语用学角度看待文本功能与译者目的,强调文本内容的同一性与互文性; 4) 从交际信息论视角考察翻译过程,强调翻译是受外部动机驱动的人际活动与形式,侧重读者与译者之间的交际效果,暗示读者与译者之间存在的主体间性; 5) 视翻译为人类呈现、认识与解读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寻求以概念重组形式达到与原文本等值的认知; 6) 以符号呈现客观世界,译者与读者阐释文本符号所指意义,再现原文本所指、译文本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对应关系。

可见,国内学者的定义较单一,仅从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符号的转换问题,没能从多角度、多层面定义翻译概念,相关学派的特征不够明显。在某种程度上,翻译概念界定属于科研工作中的逻辑界定,可映射出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整体状况与问题,即没能深入而系统地将其他学科理论融入翻译研究,大多仍处于脚注式的探索,尚未吸收特定研究领域的精髓。相比之下,外国学者的定义涉及结构语言学之二元对立、功能语言学、篇章分析等,吸收了转向三元哲学的语言游戏论、语用学的会话含义和关联理论,引入信息论、交际学、传播学、阐释学、现象学、符号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丰富了翻译的界定和理论研究。就是因为借用了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思考符号转换问题,翻译研究才能脱离传统语文学范式,走向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符号学、文化学、比较文学、阐释学、现象学、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范式,如歌德从传统的二元视角从事经典文本翻译,转向以引入东方文学建构世界文学为目标,打破了施莱尔马赫提出的归化与异化的二元对立范式,建立散文式、戏仿式和对等式的三重范式。

如今,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符号转换现象也不断丰富,逐步走向跨域的多层面合成,翻译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未跟上时代的发展,有关文本转换为影像、思想转换为文本、实体转换为图像等的翻译现象有待系统考察。可是,就翻译理论的发展而言,当前还无法凭借固有的翻译理论应对有形与无形符号<sup>②</sup>相互转换的问题,故有必要转换视角,以符号学和学科方法论为基础,建立考察符号转换为对象的学科——翻译符号学。

### 3. 翻译符号学的界定与研究对象

国内以符号学探讨翻译的相关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程度

的发展,但仍囿于以符号学诠释翻译现象,以翻译论据验证符号学理论,停滞于脚注式阶段,仍滞留于文本、阐释过程的层面,尚未关注有形与无形符号之间的转换过程,未及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跨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构建,有待于转换视角构建系统化、理论化、思辨性、本土化、创新性的翻译符号学理论体系。翻译符号学这一术语在国内还较新,贾洪伟于2014年在“第十一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的宣读论文“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中首次提出。

在国外,该术语早已有之。1990年,格雷(Dinda L. Gorlée)在“意大利安达尔西亚符号学会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翻译即叛逆:论翻译符号学”(Traduttore Traditore: Semiotica de la Traducción),文中提出“翻译符号学”术语,后改称“符号学翻译”。随后,爱沙尼亚共和国特鲁普(Peeter Torop)在《俄罗斯文学》1994年第4期发表专文“翻译符号学与符号学翻译”(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of Semiotics),探讨二者的关系,后在“走向翻译符号学”(Towards the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2000)、“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前景”(The Possible Fate of the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2001)、“翻译与符号学”(Translation and Semiotics 2008)等文中,从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学科本质与属性、内在构成、学科前景等角度,不断深化翻译符号学的理论构建。可见,在国际学界,翻译符号学这一术语早已有之,但学科构建工作仍处于萌芽状态,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

#### 3.1 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必要性

与现代学科相比,翻译学尚未取得独立的平等地位,原因可能是:翻译研究的声望并不取决于翻译研究本身,只有通过研究翻译现象,其他人文学科才能更好地理解其研究对象,翻译研究才能被重视(Lambert 1992: 25)。换言之,只有翻译研究很好地定位自身的学科地位,为其他学科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务,才能被认可和重视,学科的属性问题也才能确定。要完成这一使命,翻译学就有必要从多学科的视角,使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符号转换活动及其相关问题。

从现代学科的交叉视角考察翻译,说明学者的兴趣已从双语文本关系,转向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功能,即维特根斯坦在谈及“语言游戏论”时所言的“生活形式”。面向跨学科的发展时,翻译符号学指称的是翻译问题引发的普遍性观念变化,而不仅是新学科的重构(Torop 2000: 597)。

翻译学与符号学联姻之标志是将翻译活动与文化研究或翻译学视为跨学科事件,探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接触、符号转换、符号意义阐释的可能性限度、文本再生、文本间性、主体间性、符号意指的本质等,这是此前翻译学探讨得不够深入之处,也是此前符号学界极少关注的对象。从符号学视角出发,打破翻译研究的原本与译本、编码与解码、译者与读者、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等的二元观,以符号学三元观研究翻译现象及其相关问题,不但可推进翻译研究的理论构建,更会丰富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和思考空间,因而不论从哪方面说,翻译符号学研究都是势在必行的。

### 3.2 翻译符号学的界定

翻译符号学是翻译研究和符号学的一部分,其英文术语为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或 *translation semiotics*。特鲁普(Torop 2001: 46) 从文化符号学出发,认为翻译符号学属翻译学又属符号学,前者探讨可译性,从语言世界观到译本的文化功能,侧重文本分析中的符号连贯性;后者对符号系统及其与翻译符号学内在的相互关联关系加以比较分析,既侧重符号学理论又侧重符号学应用。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认为翻译符号学之本质是文化分析的基础,旨在通过翻译过程的普遍性符号模式,描述文化交流和元交际现象,研究符号系统的可译性限度,考察文本间性、语域间性、媒介间性系统之间的复杂联系。我们提出的翻译符号学并非以文化符号学为出发点,也不专以皮尔士符号三元观为唯一依据,而是以符号学一元、二元和三元观为理论基础,考察有形与无形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现象,旨在建立符号学的分支学科。

在翻译符号学视域下,符号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具体联系具有重要作用,即创生了联系翻译研究中的符号学应用与以符号学阐释翻译活动的前提,使其成为具有同质性的学科整体。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必要对其加以逻辑定义,以便确立其研究对象、范围、任务和学科归属。

之所以出现翻译符号学,是因为社会文本交际发生普遍性变异,出现新的文本问题、分析对象、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新视角。Torop(2000: 602-603) 认为,从翻译学角度探讨符号学问题,系翻译符号学学科构建的前提。当前,学界倾向以皮尔士符号学为学科基础,以 *semio-translation* 指称翻译指号过程。以 *semio-translation* 指称翻译符号学,难免出现翻译符号学与符号学翻译之间的学科所指、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学科属性等层面的混淆,虽然两者均以符号转换中的指号过程为主要对象,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

现以有关思考为据,将翻译符号学定义为:翻译符号学为符号学门类下的分支学科,系在符号学研究方法论指导下,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据,使用符号学方法,探讨翻译发生过程中的符号转换现象及其相关问题。从符号学和翻译学的当前发展看,翻译符号学属符号学之新创学科,旨在建构以符号转换为对象的符号学分支理论体系。

### 3.3 研究对象

翻译符号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决定着翻译符号学之内在构成,影响着该学科今后的发展。Torop(2000: 599) 认为翻译的研究对象为翻译过程,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为符号和符号系统,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当融合翻译和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可事实却并非如此。翻译符号学关注的不仅是翻译过程中的指号过程,还涉及原本与译本之间的符号转换关系、文本间性、主体间性、符号阐释性,以及基于原本和译本产生的附文本(译者前言与后记、作者与译者之相关文章、原作与译作评论、补遗、注释等)现象和过程,如 Gorrée(2010) 和 Gorrée(2012) 所示。

以翻译符号学研究对象为据, Torop(2000: 607) 认为翻译符号学内在构成为: 1) 将翻译符号学视为符号学翻译,以语言、文本和文化的符号特征为基础; 2) 互补翻译符号学分析元交际和全译引发的文本关联; 3) 社会翻译符号学以后殖民翻译、后现代翻译和符号翻译研究的问题为始源,如话语实践、惯例、读写能力等; 4) 过程翻译符号学从符号学角度描写翻译过程的实现模式及应统一描写翻译类型之需而构建的翻译过程模式; 5) 真空(radical) 翻译符号学使用符号手段,分析符际翻译现象。其实,将翻译符号学视为符号学翻译恰是学科界限不明的显性标志,虽然两者均以语言、文本和文化符号特征为基础,但翻译符号学还包括有形与无形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实体物象转换为实体符号或言语符号、思维与思辨转换为言语符号、言语符号转换为思维或思辨、言语符号转换为非言语符号),余下4项则完全属于翻译符号学的范畴。

具体言之,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为有形和无形符号的转换及其相关问题: 1) 以物理形式为载体的有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如言语符号转换为言语符号、言语符号(语言文字)转换为非言语符号(手势、姿态、妆容等)、非言语符号转换为言语符号(如构思到文字); 2) 有形符号转换为以非物理形式为载体的无形符号,如文本转换为思考、思辨,行为转化为思维反应; 3) 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如构思到文本、画作、乐谱等,以及符号转换中涉及的过程、行为、关系、层级、间性(符号间性与主体间性)、守恒、功能、偶然性与阐释性等相关问题。

相应的,翻译符号学内在构成包括: 1) 以符号学一元、二元和三元观及其研究方法论为基础; 2) 以有形与有形符号、有形与无形符号相互转换过程中涉及的文本与文化特征为对象和范畴基础; 3) 以符号转换过程中侧重的交际和信息内容引发的符号文本关联和人类“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语)中的话语实践、惯例、读写能力、意识形态、社会需求与功能、译者意图与目的、文本等为考察任务; 4) 以符号转换过程为依据构建翻译符号学理论与应用的相关模式。

## 4. 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定位

翻译符号学要确立为新兴学科,就有必要与称谓相似的符号学翻译研究和符号翻译学加以区别,明确翻译符号学的学科本质与属性、研究对象与范围、学科使命等。继1990年提出翻译符号学之后,格雷又提出 *semio-translation* 术语<sup>③</sup>,分别对应本文的符号学翻译研究和符号翻译学,尽管在英文语境中并无本质区别,可汉语学术环境下的境况就有所不同了。

### 4.1 翻译符号学与符号学翻译研究的区别

翻译符号学系符号学的分支学科,以符号学自有理论研究翻译发生过程中的符号转换及其相关问题,既包括言语符号转换成言语符号,也包括言语符号转换成非言语符号、非言语符号转换成言语符号及非言语符号转换成他类非言语符号,旨在构建以符号转换为对象的符号学理论。

符号学翻译研究则为翻译学中的一个附属范畴,借用符号学理论研究翻译文本问题,仅局限于雅可布森之语际翻译范畴,以符号学理论阐释翻译现象,属于翻译学的附属范畴,处于以符号学理论解释翻译现象、验证翻译理论的关注式研究,还未上升到“学”的阶段。可见,两者的本质、属性与学科归属均不同。

此外,两者的服务对象和目标也不同:翻译符号学并非为翻译实践、翻译教学服务,如同语言学并非服务于指导人类如何讲话一样,而符号学翻译研究则针对翻译的过程、符号转换、文化处理等层面,旨在为翻译研究与教学提供有益的启示。

#### 4.2 翻译符号学与符号翻译学的区别

从语义焦点层面讲,翻译符号学侧重以广义翻译范畴中的符号转换为切入点,以自有理论为依托,构建符号学分支理论和研究方法;符号翻译学以翻译过程中涉及的符号问题为切入点,借用符号学理论方法及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以皮尔士将符号作为一种“进阶式”思维方法的考察和分析为特征,将翻译观与意义的翻译建立在皮尔士逻辑术语框架的分类与再分类基础上,将符号学视域下的符号(代表项)一对象一解释项分为三元动态网络(分别对应于皮尔士的一级、二级和三级符号范畴),构建翻译学分支学科理论与方法论。

可见,两者的切入点(前者以广义的翻译范畴为切入点,后者以符号现象为切入点)、理论与方法依据、旨趣(前者为符号学分支,后者为翻译学分支)及学科归属(前者为符号学,后者为翻译学)均有所不同,两者虽然使用类似研究方法,却属不同学科,为不同领域的受众服务。

#### 4.3 学科定位

如前述,翻译符号学以符号学一元、二元和三元观为基础,探讨广义翻译范畴内的符号转换及其相关问题,建构符号转换相关问题的符号学分支学科,既包括宏观的理论又包括微观的应用,打破了以往只侧重有形符号之间的转换,将研究范围扩展至有形与无形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及其相关问题,不但丰富了符号学的疆域,也符合新时代符号转换的多层次、多媒介跨域合成的新需求。

### 5. 结语

近年,符号学疆域得以不断拓展,国内学者纷纷关注符号转换及相关问题,促生了以符号学为基础的符号转换研究,创建了跨学科性质的符号学分支学科——翻译符号学。翻译符号学的不断完善可丰富符号学的类型研究,亦可推动符号学的本土化进程。

要建立翻译符号学,当前须做好如下工作:1)搜罗和翻译国外相关著述,建立和健全翻译符号学资料库,如皮尔士、莫里斯、维特根斯坦、洛特曼、艾柯、格雷、特鲁普等;2)整理和吸收各家之长,厘定学科术语,确定研究范围、对象、任务和目标,借鉴前人经验构建学科理论;3)创立学科哲学,从哲理层面建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健全学科理论,

用以指导微观研究;4)吸收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学者,壮大研究队伍,促进国内外学者间的交流,扩大国内外学术影响力。

#### 注释:

- ① 为节省篇幅,笔者未列中国 17 条和外国 26 条翻译定义,若有读者想参考该数据,可直接来函索取。
- ② 本文所用有形和无形符号这一二元对立的术语,系笔者以符号存在是否以物理媒介为依托来界定的。有形符号以物理媒介为载体,包括言语符号和非言语符号两类,并以言语符号为核心成员;无形符号不以物理媒介为依托,系思维、心智范畴内的活动,如思考、思辨、构思等。
- ③ 有关文献为 Goriée, Dinda. Meaningful mouthfuls and semiotranslation. In Susan Petrilli (ed.). *La Traduzione Athanor: Semiotica, Filosofia, Art, Letteratura* (Bari), X<sub>2</sub>(1999-2000), 2000: 124-138. 亦见 Susan Petrilli (ed.).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msterdam and New York, NY: Rodopi, 2000: 235-252 和 Goriée, Dinda. Vital signs of semio-translation, *Semiotica* 2007 (1): 159-161.

#### 参考文献

- [1] Goriée, Dinda. Traduttore traditore: Semiotica de la traducción [A]. In Antonio Chicharro Chamorro & Antonio Sánchez Trigueros (eds.). *Actas del III Simposio Internacinal de la Asociación Andaluza de Semiótica* [C]. Granad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Microfiche, 1990: 34-40.
- [2] Goriée, Dinda. Metacreation [J]. *Applied Semiotics*, 2010(9): 54-67.
- [3] Goriée, Dinda. Goethe's glosses to translation [J]. *Sign Systems Studies*, 2012(3): 340-368.
- [4] Lambert, José. The cultural component reconsidered [A]. In M. Snell-Hornby, F. Pöchhacker & K. Kaindl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2: 17-25.
- [5] Landa, Garcia. Notes on the epistemology of translation theory [J]. *Meta: Journal des Traducteurs*, 1995(3): 388-405.
- [6] Lefev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5.
- [7] 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New York &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8] Torop, Peeter.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of semiotics [J]. *Russian Literature*, 1994(4): 427-434.
- [9] Torop, Peeter. Towards the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J]. *Semiotica*, 2000(3): 399-411.
- [10] Torop, Peeter. The possible fate of the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J]. *Interlitteraria*, 2001(6): 46-62.
- [11] Torop, Peeter. Translation and semiotics [J]. *Sign Systems Studies* 2008(2): 253-257.
- [12] Torop, Peeter. Preface: on the paths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with Peeter Torop [J]. *Sign Systems Studies*, 2012(3): 269-278.
- [13] 董敏. 语篇分析的宏观社会符号观——符号学和功能语言学视角 [J]. *外语教学*, 2005(5): 5-9.
- [14] 赵宏. 单纯语言符号的理据性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1(3): 11-14.

作者简介:贾洪伟,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部副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符号学、中外语言学史。

收稿日期 2015-05-22  
责任编辑 禾木